

经典流芳

中国戏曲闪耀世界舞台

傅 瑾

在英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是绕不过的一座山峰。作为英国学院画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之一,透纳将风景画推升至与历史画、肖像画同等的地位。他笔下关于光线、色彩的独到技法更为后世的印象画派和抽象主义画派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自然的再现者

徐 鹏 辉

年少成名志向远大

1775年,透纳出生于伦敦科文加登的梅顿莱因,家庭并不富裕,但父亲十分看重透纳的绘画天赋,送他去建筑师画家托马斯·马尔顿那里学习。擅长透视画法的透纳接手大量来自建筑师的画作订单,无形中锻炼了绘画技巧。

1789年,14岁的透纳进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仅过一年便崭露头角,在春季展览上展出自己的水彩画。4年后,透纳建立了自己的画室,尽管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他手中从未出过一件马虎的作品。画家爱德华·戴斯曾以他为例,称“勤奋加自制,没有老师也能突飞猛进”。透纳后来也在日记中写道:“仅仅有天分是不够的,必须刻苦勤奋,多加实践。”1802年,透纳被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破格接纳为最年轻的正式会员,被称为“天才画家”,在绘画领域展现出愈发纯熟的艺术造诣。

年轻的透纳毫不遮掩自己的远大志向。在21岁送展的水彩画《圣伊拉斯谟与伊斯利普斯教堂》中,他在画作前景的墓碑上刻上了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暗示自己将来会在代表着荣耀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拥有一席之地。纵观透纳的一生,不管是面对同行排挤还是评论家批评,他始终不放弃对艺术的热爱,坚守着努力的信念。

钟情自然匠心独运

抚弄光影驾驭色彩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改良后的蒸汽机得到普遍应用,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的急剧变革加深了民众的不安全感,传统宗教画不能满足心理需求,萌芽于17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又开始进入人们视野。透纳在风景画中别出心裁地加入工业元素,赢得诸多赞誉。

以1844年的作品《雨,蒸汽和速度——西部大铁路》为例:画中拥有一艘“萤火虫”级引擎的火车沿着梅登黑德高架桥驶往伦敦,烟囱冒出的蒸汽与天空中的蒙蒙细雨交融在一起。树林、田野的景色在明亮光线下尤为动人。高架桥的左侧是一座建于18世纪70年代的路桥,桥下的泰晤士河上有一艘小船,右侧有人操作着马拉的犁,铁轨上还有一只奔跑的兔子。透纳通过缩短高架桥长度、改双轨为单轨等方式着重突出了火车的速度,与奔跑中的兔子构成奇妙的对比。这是一场自然力与蒸汽机车力量的角逐。正如艺术史学家约翰·盖奇所说:“透纳画的不是西部大铁路,而是大自然力量的寓言。”

透纳擅长将风景画与历史事件结合,拓展了风景画的广度。为人熟知的1812年油画《暴风雪:汉尼拔和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描绘了暴风雪来临的阿尔卑斯山上,来自意大利的将军汉尼拔率领军队与阻击者战斗的画面。狂风席卷着暴雪,将太阳缩成一个圆点,大自然的强大气势衬托出人类的渺小无力,战争的残酷感喷薄而出。

透纳的一生有超过1.9万幅画作和素描,其中不少是在旅行中完成的。他年少便养成旅行、速写的习惯,在英国大大小小的乡村留下足迹,完成一系列杂志插画作品。他对欧洲大陆也十分熟悉,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到法国的卢浮宫,从德国的莱茵河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大自然给予透纳无限灵感,更将他的风景画创作推向新的高度。

一直将17世纪法国风景画家克劳德·洛兰视为偶像的透纳,在风景画领域开创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在他看来,



这恰恰是商业演出的优势所在。

在文学艺术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要我看”和“我要看”的最终效果往往大相径庭。梅兰芳的多次出访,尤其是他三赴日本和1930年访问美国都是典型的商业演出,中国京剧院在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过成功的商业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大洲,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演出所收获的不仅仅是票房,更重要的是借助戏曲千百年的丰厚积淀,令世界对中国和中国的优秀文化艺术有更丰富的认识和深切的理解。传统戏曲集文学、音乐和表演为一体,在叙事叙述、情感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拥有许多可以感动世界、令世人陶醉的优秀剧目,商业演出前景无限。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有更加明确的文化自觉,更积极地遴选深具人文内涵的经典剧目,更多地关注交流与传播的持续性,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努力开拓海外演出市场。如此,传统戏曲将从中华文化使者真正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瑰宝。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 1 图①:京剧《锁麟囊》剧照。 资料图片
- 2 图②:马约瑟法译本《赵氏孤儿》。 傅瑾供图
- 3 图③:上海昆剧团巡演剧目《牡丹亭》剧照。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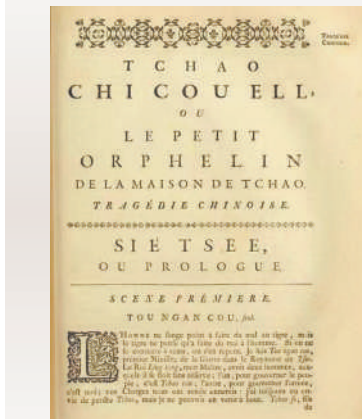
要课题。

传统戏曲要真正实现有效的对外交流传播,要自觉地从“奇观化”误区中走出来。从戏曲演出的节目选择这一初始环节开始,就着眼于人文精神的传递,要让演出聚焦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中国故事的表达。

戏曲表演集唱念做打于一体,既有文戏又有武戏,既有《三岔口》《秋江》之类主要通过形体动作传达剧情的剧目,更有大量深具人文内涵和情感深度的经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担心戏曲的汉语表达会成为交流障碍,或认为完整的大型剧目尤其是文戏难以抓住观众,武戏、折子戏及类似“变脸”这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表演往往成为首选。这些剧目固然便于国外观众接受,但局限性也较明显——表演更注重技巧性,不足以充分体现戏曲的艺术价值。事实上,那些以表现人物命运为核心的故事,能够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被分布在广阔地域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间流传,就是其具有跨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的有力证明。因此,我们对中国的戏剧叙事和舞台表演魅力应有足够自信。张火丁在北美演出时选择了京剧大戏《锁麟囊》和《白蛇传》,已经证明它们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效果;青春版《牡丹亭》在世界各国获得普遍欢迎,也说明优秀的戏曲经典能突破语言障碍,很好地传递中华文化精华。

持之以恒方能深入人心

戏曲对外交流与传播要有持续性。我们既应对戏曲表现的人物、情感和命运所具有的人类共同价值有足够的自信,又必须看到,这种异于其他民族的戏剧表达,也确实增加了交流与传播的难度。偶尔欣赏戏曲的观众或许会因其独特的艺术形态而惊艳,但要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与感动,体会其精妙与魅力,则需



雕琢透明之深

黄韵硕

2019年4月,伊达·维塔莱在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礼堂获得了西班牙语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塞万提斯文学奖。塞万提斯奖评审委员会将伊达·维塔莱的语言誉为“当代西班牙语诗歌中最引人瞩目、最为人认可的语言之一”,而她本人则给出了更诙谐风趣的解释:在获奖后的一次访谈中,她半开玩笑地将塞万提斯奖称作“长寿奖”,另一次更以谦逊而不无戏谑的口吻表明,自己获奖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高龄。

这当然是诗人幽默的表达,却也能够让读者回忆起诗人已然历经将近整个世纪的风雨。1923年,伊达·维塔莱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一个意大利裔中产之家,并在这座海滨之城度过前半生。诗人许多重要人生节点都由蒙得维的亚见证:就读于乌拉圭共和国大学,出版第一部诗集《记忆之光》,与同代作家安赫尔·拉马相识并结婚生子……直至1974年,伊达·维塔莱随她的第二任伴侣、诗人恩里克·费耶罗一同离开蒙得维的亚,前往墨西哥城,踏入创作与人生的新阶段。两人日后又迁至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一直到恩里克·费耶罗去世一年之后,即2017年末,伊达·维塔莱最终决定返回故乡。而恰恰是在次年,她在尚未搬迁完毕的新公寓里接起通知获奖的电话。

从睁眼见到第一束“记忆之光”的1923年,到重返故乡并获得塞万提斯奖的2018年,从蒙得维的亚到墨西哥

城,奥斯汀再到蒙得维的亚,自起点出发又回返的旅程中,95年已匆匆流逝。如今,伊达·维塔莱已是当年乌拉圭文坛“45年一代”唯一还在世的成员,也是一个时代仅存的见证者之一。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古巴革命,拉美国家军政府的上台与垮台,诗人的整个人生历程同这些拉美乃至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交织,也同文坛许多耀目的名字彼此映照。西班牙内战后,西班牙作家何塞·贝尔加明流亡至乌拉圭,成为年轻的伊达·维塔莱文学上最尊敬的老师;古巴革命胜利后,伊达·维塔莱访问古巴,并在此结识何塞·莱萨马·利马、胡里奥·科塔萨尔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乌拉圭军政府的上台则使得伊达·维塔莱离开乌拉圭前往墨西哥,融入以奥克塔维奥·帕斯为中心的文学圈,在创作上深受这位墨西哥诗人的影响……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伊达·维塔莱不仅见证了文学与历史的潮流,更积极参与其中。

但正如塞万提斯颁奖词中看似对立的形容一般,伊达·维塔莱的创作与人生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矛盾修辞。一方面,她热衷于与同代作家交游,更以无穷的精力投入办刊、撰稿、翻译、写作诗歌与散文等文学事业;但另一方面,她在诗歌中呈现出面貌又是相当收敛而内倾的。她的诗风透明、洗练、简洁而精确,感情表达较之肆意燃烧的火焰更似几何形状的霜花。她对待语言

的态度正如古代的炼金术士或金匠匠,每每精雕细琢,力求臻于完美,批评家常以“语言的炼金术”一词形容伊达·维塔莱的创作。

从伊达·维塔莱流传最广的一首诗《词语》中,我们即能窥见诗人对待词语与诗歌的态度:

“观望的词语/自身即神奇/许诺可能的意义/多风的/空中/被吹拂的/阿里阿德涅词语。/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令它们沦为装饰。/词语无法形容的精确/抹去我们。”

对于伊达·维塔莱而言,词语是游牧的、不定的神秘存在,诗人必须不断追寻变动不居的词语,但不能简单地将它们捕获并钉在诗中,因为“糟糕的诗歌才令词语定居”。为此,必须同时做到精确与轻盈,推翻陈旧的修辞,必要时甚至要挣脱逻辑的束缚。最后这点有时赋予她的作品以矛盾的特性——简洁,却并不易懂,透明,但也在深处显出晦暗,有如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不可见的部分远远胜过可见的峰顶。不过,伊达·维塔莱自己也曾表示,难以理解并不是坏事,意义的复杂正是诗歌的关键。诗人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追忆一则早年轶事:年少时,她曾无法理解被列为课堂必读的智利诺奖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诗《山峰》一诗,然而,正是这种不理解激发了她对语言和文学的兴趣。

在倾注心血打磨诗歌语言的同时,伊达·维塔莱也密切关注着外部世

界中的物质存在。乌拉圭诗人兼文学理论家维克多·索萨曾经这样评价:“对诗歌形体的关注与对不断变装的世界之形体的关注在伊达·维塔莱身上彼此交汇。”对语言的追求并未令伊达·维塔莱的诗歌悬空在抽象之中,读者仍能在她的诗行间触摸到具体的物质性——植物、动物、变幻的天气都以清晰的形象显现。诗人笔下的风景同样反映出她的整体写作特质,呈现出澄明、寂静、自在的面貌:

“附近花园传来叫喊/大风呼啸,铅色的鸟/或转动的滴水嘴,/汽车竭尽全力/不停攀爬/山丘。/但天空,/蔚蓝,/即静默。/而火山/在空中洁白。”(《玻璃之下》)

阅读过伊达·维塔莱的诗作后,即会意识到“透明且深邃”这一形容之精辟。她的诗歌近似一种致密晶体:外在的风景、日常的经验、历史的变动再加上丰富至难以细数的文学上的影响,一切都被诗人摄入内部,缓慢沉淀,析出结晶。从这一角度看,伊达·维塔莱的人生与创作或许又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生活提供丰富而璀璨的原料,而诗人在诗歌这一“语言的炼金术”中以无与伦比的精度与耐心将其雕琢,赋予其状似悖谬实则统一的特性:一种透明的深邃。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